

評《山乡巨变》

“人民文学”編輯部編

10(7)1

33

1

3



作家出版社

評《山乡巨变》

“人民文学”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

人民教育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293 字數32,000 開本787×1092 紙 $\frac{1}{32}$ 印張 $1\frac{7}{8}$ 插頁4

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冊

定價(4) 0.19元

出版說明

周立波同志的長篇小說“山乡巨变”在“人民文学”上連載又經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許多报刊發表了对它的評論文章。这些文章对作品中積極的思想意义、鮮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風格和生动的語言作了具体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作品的某些不足之处。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人民文学”、“新苗”上的文章。其中的作者有的是作家，也有作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我們喜爱‘山乡巨变’”的作者尊梅同志是湖南益陽市市委委員。“从生活到文学創作”的作者李年玉同志是益陽市桃花仑乡农業合作社社員。他們都是曾經和周立波同志一起在桃花仑乡工作、劳动过的。他們的文章虽短，但讀起来分外亲切。方明等同志的文章在出版前沒有在报刊上發表过，是直接收入这个集子里的。周立波同志的“关于‘山乡巨变’答讀者問”，是針對“人民文学”編輯部根据讀者反映整理出来的問題所作的解答。这对于我們理解这部作品和了解作者創作这部作品的經過是有帮助的。

“人民文学”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次

- 关于“山乡巨变”答讀者問……………周立波（1）
- 讀“山乡巨变”……………王西彦（7）
- 山乡的巨变，人的巨变……………方 明、楊昭敏（20）
- 我們喜愛“山乡巨变”……………中共益陽市委委員 葛 梅（39）
- 从生活到文学創作
……………益陽市桃花侷乡桃花侷社員 李年玉（42）
- 从“山乡巨变”学做群众工作
……………益陽市郊大海棠社干部 賀堯斌（45）
- 讀“山乡巨变”的一点体会……………江 枝（48）
- 对“山乡巨变”的意見……………唐庶宜（52）
- 对周立波同志运用方言土語的意見……………葉文琴（56）

关于“山乡巨变”答讀者問

周立波

編者按：此文是“人民文学”編輯部綜合整理了讀者对“山乡巨变”的反映和提出的問題，請作者周立波同志作的解答。

問：作品中写了好多个人物，个个生动、逼真，活灵活現，一出場就很自然的吸引了讀者。特别是亭面糊、王菊生、陈先晋几个人物更是形象鮮明，具有真实感，讀后給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不知这些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兒？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有些什么体会？

答：这些人物大致都有模特兒，不过常常不止一个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縮影，有些是另外两个富裕中农的行狀。面糊是我們这帶乡間極為普遍的性格，我們一位鄰居恰巧是具有这种性格的鮮明的特征的貧农。但書上也不全是写他，我碰見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陈先晋这个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訪得一次，平素，从別人的口里，主要是从他亲戚的口里，多次听到談起他，而且，我也观察和分析了和他屬於同一类型的另外几个較為守旧的貧农。

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須在他所要描写的

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較長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們的言行、習慣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的生活的規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細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創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馳騁自己的幻想，补充和發展沒有看到，或是沒有可能看到的部分。

沒有接触和研究过的人最难描画。

問：作品中采用了群众的語言，生动、朴素，有濃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不知作者是怎样采用了群众語言的？有的讀者認為不應該用这么多方言土語使外乡人看不懂。不知作者对这个問題有什么意見？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語言有些什么看法？

答：在农村和工厂，我常常留心傾听一切的人的說話，从他們口里，學習和記取生动活潑的語言。使用方言土語时，为了使讀者能懂，我采用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須使用估計讀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运用，使得讀者一回生，二回熟，見面几次，就理解了。方言土語是广泛流傳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語言，如果完全摺弃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損失。有些方言，字同音不同，如“拆壁补壁”，照这地方的土音（璧音Bia）講起来，恐怕只有本地人能懂。但写了出来，別的地方还是看得懂。这样的

方言，我主張多用，因為它們可以豐富普通話的語彙，加強它的表現力，又不難理解。有一些土話，有音無字，或是不知道那個音是哪一個字轉化而成的，寫了出來，別處的人看不懂。比方，我們這裡有句這樣的話：“和尚錯了臘肉，亂犁子犁，”意味相當地深遠。吃齋吧素的和尚是不應該有臘肉的。既然有了，又失去了，急得亂跑亂找，又不好聲張。拿這句話來形容暗中著急的人的心情，實在是生動。但它有兩個動詞：錯和犁，別處地方的人看不懂，必須說明錯是失，犁是奔跑和騰撞的意思。等到解釋了半天，這句話的生動性和幽默味，已經損失了。碰到這樣的土話，我雖然歡喜，但也只好不用它。

有些地方特有的事物，器具，如北方的睡覺的“炕”，南方舀水的“端子”，寫在書里，全國的人不一定都懂，我沒到北方以前，不曉得“紅樓夢”里描寫的“炕”是什麼樣子。沒有到過南方的北方人一定不曉得“端子”是什麼玩意。但這樣的名詞還是要用，估計讀者不懂時，可加注釋，我就是這樣做的。

我以為文學語言，特別是小說里的人物的對話，應該尽可能地口語化，但也要提煉，潤色，要多少有一些藻飾。

問：作品的結構具有特點。每一個章節差不多都集中描繪一兩個人物，單獨看某一章節也能引人入勝。也有的讀者說這樣的結構顯得零亂，雖然整個作品的中心是

圍繞“建社”問題，但在具体的故事情節方面，缺乏一個中心綫索貫穿全篇。不知作者對這個問題怎樣看法？在寫作過程中對於情節結構方面是怎樣構思的？

答：創作“山鄉巨變”時我着重地考慮了人物的創造，也想把農業合作化的整個過程編織在書里。我這樣做了，不過是着眼有遠有近，落墨有淡有濃，考慮到運動中的打通思想，個別串連，最適用於刻劃各式各樣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了這段，至於會議，算賬，以及處理耕牛農具等等具體問題，都寫得簡明一些。在“入鄉”和“區上”兩章里，我想，人們可以感覺得到，合作化是一個全國性的規模宏偉的運動，上自毛澤東同志，下至鄉的黨支部，各級黨委，全國農民，都在領導和參加這個歷史性的大變動。清溪鄉的各個家庭，都被震動了，青年和壯年男女的喜和悲，戀愛和失戀，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和運動有關。

新與舊，集體主義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銳、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貫穿全篇的一個中心的綫索。

結構顯得零散，是因為在描畫人的肖像和再現運動行程兩個方面，想得更多些，沒有勉強地去生造一個整個的故事。在章與章間，我注意了銜接的問題。懸念或伏筆，襯托和波瀾，以及高潮等等這些文學的章法，我都略懂，而且有時也使用，但根據人物的發展和事件的起落的情況，這些技巧能用則用，不能用時，沒有勉強。我以為文學的技巧必須服從於現實事實的邏輯的發展。

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滸傳”和“儒林外史”，都是着重人物的刻划，而不注意通篇結構的。我讀过这些小说，它們給了我一定的影响。

問：作品中关于盛淑君和李盛氏的爱情生活是怎样来的？是根据事实还是虛構的？

答：盛淑君的爱情是农村姑娘的情感。李盛氏的爱情是在婚姻上遭了不幸的农村少妇的情感。按照她們的年齡、身份和遭遇的不同，我揣摩和描繪了她們的不同的恋爱。

記得一九五六年，我在乡下写这書的初稿时，我的滿妹的一个鄰舍妇女来找她。这位年輕的劳动妇女，身上穿着新婚时节的大紅玻璃緞棉襖，还在打听她丈夫，但他已經和人結了婚，她不知道。她的遭遇和面容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她身上，我發展了李盛氏的失恋和恋爱的故事。不过她的那种劳动妇女的結实的外形，却是属于別一妇女的。

既然是小說，不是傳記，不是真人和真事，自然不免有虛構的成份，但我以为虛構只能建筑在作者对于现实中的人和事的細心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沒有这个坚实的基础，虛構就会变成沒有根子的憑空的捏造，那是不会动人的。

問：作品的結尾似有些倉促。象秋絲瓜，刘雨生等人在作品前部分很突出，而末尾沒有写出他們有什么發展和变化。又如龔子元夫妇下場如何沒有交代。不知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結尾？是否有些生活素材还没有写进去？作者是否准备写它的續篇？讀者是非常希望能看到續編的，并且想早点知道續篇的内容是怎样的……

答：“成立”不过是一个小結。龔子元夫妇的故事还没有完畢。陈大春和刘雨生的恋爱还会有發展。在初稿上，关于秋絲瓜和龔子元，本来都多写了一章，后来，为了压缩篇幅，剪除过繁的枝蔓，我把它們删去了。

我准备写作續篇。对續篇來說，已經点出的龔子元的事情不过是伏笔。他們的下場会怎样？大家猜吧。

（載于“人民文学”一九五八年七月号）

讀“山乡巨变”

王西彦

周立波同志在“暴風驟雨”中，描写了农村里那一場掀掉几千年封建老根的翻天覆地的階級斗争——土改运动；而在他的新作“山乡巨变”里，又描写了农村里另一場巨大的革命运动——农民們抛弃了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农民們在解放后所经历过来的兩場巨大的革命运动，虽然“暴風驟雨”写的地区是东北，“山乡巨变”写的是作者的家乡湖南，但从它們所反映的历史情况来说，这两部作品是有連貫性的，甚至可以說是姊妹篇。

在“暴風驟雨”里，最吸引我們讀者的，就是作者在描写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时，能够通过农村社会复杂的階級关系，反映出农民們思想感情的細微曲折的变化。在“山乡巨变”里，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也是很成功，很能吸引人的。我們知道，对农民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种比土改运动更深刻的革命。农民們在土改运动中所表现的那种对地主階級的仇恨，那种对土地的渴望，是孕育在長期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压迫的关系里的，只要剝削和压迫的鎖鏈一解除，就会爆發出来。可是，农业合作化运动，

却要求农民們抛弃那長期相沿的私有制的經濟基础，排除自己头脑里那种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个转变，自然更困难，也更深刻。立波同志在“山乡巨变”里，就用力地描写了这个转变，以及由这个转变所引起的，例如农民們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等各方面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转变。

“山乡巨变”里所描写的，是1955年冬天，正当毛主席發表“关于农業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以后，农村中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湖南省一个山乡——清溪乡农民們組織农業生产合作社时所發生的一場巨变。作者从一个派到清溪乡去負責搞合作化运动的县干部，县团委副書記邓秀梅入乡写起，一直到全乡建立起五个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为止。作者所以要这样做，很明显，是为了写出党在农業合作化运动里的领导作用。这一条紅綫，在作品中通过邓秀梅，乡支部書記李月輝，以及圍繞在她們周圍的一批積極分子形象，从头到尾貫串着。就是这样一些人，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形势逼人高潮，成为整个合作化运动中的主流。

从作品中我們还看到：这究竟是一场解决个人和集体、私有和公有的深刻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会是一帆風順的，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要战胜各种各样的阻力。不要說破坏分子的陰謀破坏，中农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資本主义道路之間搖摆不定，就是貧农中間，也有比較保守落

后的，还有觉悟过低，跟在富裕户屁股后面跑的；甚至共产党员里面，也有对工作忽冷忽热的。在“山乡巨变”里，作者写出了破坏分子龔子元的陰謀活动，写出了和龔子元有勾結的新上中农張桂秋的搗蛋阻撓，写出了富裕中农王菊生的抗拒入社，也写出了陈大春的父亲陈先晋的保守落后，更写出了虽然是貧农却受張桂秋利用的符賤庚，写出了像謝庆元那样的表現不很好的共产党员。这样，这一場革命运动，就呈现出它应有的复杂性，而且使得农村中兩条路綫的斗争尖銳化，深刻化了。这是这部作品另一方面的成就。

但是，不論是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也好，农村中兩条路綫的斗争的尖銳复杂也好，这一切，都要求着作者在人物刻划上的努力。我們讀者，总是通过作品里面人物的活动，去認識社会生活的真实。人物的面貌愈清楚，性格愈突出，对我們的吸引力也就愈大。正是在这一点上，“山乡巨变”的作者立波同志，付出了他巨大的努力，也获得了成就。我在“人民文学”上开始逐期閱讀这部作品时，一下子就給人物鮮明的形象所吸引，讀完了前一部分，就迫不及待地等着讀下一部分，我关心这些人物的命运，关心他們的生活和斗争，成功和失败。在这样的時候，我就回想起自己讀“暴風驟雨”的情形，發現这种类似的喜悦，是我曾經经历过的；而“山乡巨变”給我的喜悦，好像还要大一些。也許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

和东北的农村相比较，我对湖南的农村稍微熟悉一些，出现在“山乡巨变”里的那些人物，对我也更亲切一些。在这里，当然不可能談論到作品中每一个人，只能談一談几个給我印象特別深的干部和农民。

县干部邓秀梅，是我們讀者最先接触到的。我想，我們大概都会喜欢并且尊敬这个年青的短頭髮姑娘吧？你看，一九四九年家乡解放时，她才十五岁；七年以后，她就能够独当一面地来負責一个乡的工作了。重要的，还不在于她原是一个山村角落里沒有见过世面的姑娘，也不在于她很年輕，而在于她在清溪乡合作化运动中所表現出来的那种沉着老練，那种刻苦耐勞，那种胆大心細。她剛入乡，就在路上認識了亭面糊；接着，又和盛淑君打上了交道。人还没有跨进乡政府的門坎，可已經从群众中間摸到了一些情况。而当她一和党支書李月輝以及团支書陈大春見了面，就和他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此后，無論是深入群众，团结干部，掌握政策，破获破坏活动，她都做得很好。她自然是很辛勞的，作者也特別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写这一点；但她始終很愉快，有时簡直是調皮的，一开始，盛淑君还說过她“不正經”。对于爱情，她有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就貫徹在自己的行动里，很好地处理着自己的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也給了清溪乡的年青人有益的影响。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在工作中，她总是站在妇女这一边，多給妇女着想，多給妇女講話。而且，她也有合乎

她身分的缺点，例如，由于算术不高明，她彙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不十分精确，因此受到了区委書記朱明的責备；又例如，因为安放文件粗心大意，結果給破坏分子龔子元的堂客鑽了空子，利用來造謠生事，掀起一陣砍樹的風潮。

和邓秀梅相比較，乡支書李月輝的性格，就更加突出。这个十三岁起就成为孤兒的貧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是“不急不緩，气性和平”的人物，“全乡的人，無論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人家喊他“婆婆子”，因为他为人有些婆婆媽媽。他这种性格，使他在合作化初期，跟区上的同志們一起，犯了一点右傾的錯誤。可是，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党员，对党的事業，有無限的忠誠。婆婆媽媽的另一面，就是不急不躁，沉着稳定。他的群众关系好極了，在群众中間的威信很高。邓秀梅剛入乡时，碰到盛淑君，提起亭面糊信了謠風，“你們相信嗎？”邓秀梅問。“李主席沒講过的話，我通通不信。”盛淑君回答。这李主席就是李月輝，因为他又是农会主席。这样輕輕一筆，作者就把李月輝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写出来了。和他这种温和的性格相适应的，是他作風的民主，他的謹慎小心。邓秀梅和他初次見面，把党员关系信交給他时，作者写他“打开長桌屜上的小鎖，把信收起，又鎖好抽屜”。他对干部和群众，都有正确的看法，知道他們的优点，也明白他們的缺点。他肯原諒人，但并不是無原則的迁就。他是联

系群众的好榜样。他自己說：“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党教育我：“共产党员一时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我一逞性，發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就这样，他团结好一批干部和积极分子，贏取了群众的信任，和邓秀梅一起，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领导到成功的道路上。从李月輝身上，使我們看到了老一輩农民中間的觉悟分子，农村里很好的领导人。

在貧农里面，亭面糊是作者一个非常出色的創造，也許是“山乡巨变”里面最吸引人、最使人不能忘怀的角色。自己分明是一个貧农，却又怕人看不起，要吹牛說“我也起过好几次水”；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在土改时得到了好处，却又輕信謠風，認为互助組“不如不办好”；听到合作化运动的号召，馬上就下命令叫二崽写申請書，却又完全不能認識破坏分子龔子元的面目，在龔子元家里貪杯誤事；就在自己家庭里，爱發脾气，爱罵人，爱下命令，却不受兒女們的尊敬……。总之，在他身上，充滿了矛盾。他的性格有可爱的一面，却又和他的綽号那样，很有些面面相觑。他的缺点是有很多的，除了上面所說的，还有不問对象，一張嘴巴乱說，随随便便就对別人“推心置腹，披肝瀝胆”；又不喜欢开会，有会就派遣二崽去当全权代表，自己去开了，又自管自地打鼾睡覺等等。在农村里，在老一輩农民中間，我們的确很容易碰到这一类人物：过去旧社会長期的经历，在他們身上留下了較多的旧习惯，旧思